

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

〔日〕 义文 笈志刚译

内容提要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将其编写的预定于2002年使用的初中教科书交付文部省审定之前,特别编写了《国民的历史》一书作为教科书的宣传。该文对编纂会“人为地制造《国民的历史》的“畅销”以及为此煽动国民运动的缘起、经过、现状和所谓“国民运动”的本质等进行了披露和分析。《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观形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对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编纂会所从事的逆历史而动的运动前途是渺茫的,其违背民意的举动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文章还同时介绍了与编纂会做斗争的进步运动及组织,号召进步的有识之士坚决抵制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逆流。

关键词 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国民的历史》 国民运动

人为制造的畅销书

1997年,诽谤、攻击现行教科书存在“偏见、自虐、反日”内容

^{*} 此文撰写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8家出版社2002年初中历史教科书之前。作者是日本出版工会教科书对策部副部长,支持家永教科书诉讼全国支援运动委员会委员,现任日本“面向21世纪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事务局长。著有:《“慰安妇”问题和“教科书攻击”》(高文研1997年版)、《教科书攻击的深层》(学习之友社1997年版)、《为什么现在战争责任是个大问题》(合著,教育史料出版会1988年版)、《揭穿教科书攻击的谎言——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险恶用心》(青木书店2000年版)等。

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在喧嚣中成立,1999年10月29日,由该会会长西尾干二编写的《国民的历史》发行(“编纂会”编辑、产经新闻社发行、扶桑社经销),在此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预定活动。这本书第一版印刷35万册,之后,几次以万册为单位增印,并连续两个月排在综合畅销书第七位以内,到1999年底累计销售已经突破60万册,使过去销售额逐月下降而面临深刻的不景气的经销该书的书店、代销机构(者)获得了不菲的宣传效果及高额的回报。

但据书店业者讲,该书的营销与“新宗教书”的销售非常相象,即“集团购买”的现象十分明显。

在销售势头良好的宣传背后,《国民的历史》一书实际是在集团购买后在全国各地大量免费散发的。据“编纂会”的统计,在书店集团购买的书籍截止到1999年6月已预订27万册(其中单人购买最多达5万册),显然,这是由“编纂会”购买后散发给该会的下属支部及会员的。“编纂会”的事务局长高森明否认“给会员下达散发书籍的事情”,但后面将要讲到,那种否认是有原因的。“编纂会”其实是这样通过人为地制造畅销的神话,以证明《国民的历史》及他们所从事的运动“获得了国民如此支持”。

《国民的历史》散发的真相

在大阪府管辖内的公立初中的全体社会科教师(约1800人)和校长、副校长、地方议员等4000人以上都免费得到了“编纂会”赠送的《国民的历史》。在大阪的一所初中,加入“编纂会”的一位教师甚至将大量的该书带到该学校,以“送您这本书,读读看,会有帮助的”的劝诱语言向周围的同行推荐散发。

在东京,不仅教师,小学、初中、高中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

任、PTA 会长等也收到了这本书。邮寄给个人的不仅有社会科教师,还有保育、音乐教师、教育委员、批判“编纂会”的人士、新闻界人士、共产党及革新派系的区、市议员(主要是文教委员)等等。有的区内所有教师都收到了此书。不仅有通过邮局寄来的,还有的是通过毕业生、学生家长、学校周围的人直接拿到学校“派赠”的。

在东京都练马区石神井公园住宅区,小区内所有住户(约400户)均通过邮局收到了该书。在神奈川县茅崎市,除共产党外的所有市议员也收到了该书。在东京都中野区,区教委主任在例行的学校校长会上,公然向该区内的小学、初中学校的校长分发此书,引起哗然。在个别地区,甚至还有这样的咄咄怪事:从自己没有订购的书店收到邮寄的此书,并被告之:这是以您的名字预定并且已付书款。

向学校、学校校长、教师个人、教育委员、地方议员等邮寄散发《国民的历史》的现象,除上述地方外,在北海道、秋田、宫城、福岛、埼玉、神奈川、新、长野、福井、京都、兵库、高知、长崎等地都有发生,估计这种邮寄散发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

该书的散发不仅通过邮寄,“编纂会”的会员教师还将几十册至100册不等的该书带到学校,向同事教师和学生发放。发放的数量推测有几万册到超过10万册,费用(书费、邮费)达到1亿或以上之巨。

各地的邮寄人均以“关注孩子教育的父母会”(简称“父母会”)的名义,根据地区不同而冠以当地的地名而已。在随书同时寄去的信中,除了明确写有召集人姓名和联系地址外,还附有“谨呈此书,书费豁免”的字样。信件的式样也都一样,内容上多是“研阅《国民的历史》一书,您会了解到至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日本之伟大,同时产生对本来的日本意识的觉醒”、“如果孩子们能以此视点学习日本的历史的话,会对日本之伟大及日本历史之原貌产生新

的认识”等等。

“编纂会”的幕后活动

对上述的散发行为，“父母会”等团体解释说，因为被散发者在来信中表示感兴趣才邮寄的，但事实并不是那样。

《国民的历史》的首发式是在10月29日，假设“父母会”等所言是实，在首版发行后，有阅读者感兴趣要求订阅，那么，从阅读、提出要求到书籍送到，总是需要时间的（要通读一遍《国民的历史》一书，即使是历史学家也要4天以上）。但是，东京“父母会”的赠书日期却是“平成11年10月”，大阪“父母会”赠书日期为“11月2日”，如此短的时间，根本不能“通读一遍后”而感兴趣，所以是在出版前就早已准备好，首发销售开始后立即邮寄的。事实上，大阪“父母会”的召集人已经承认在邮寄时尚未阅读该书。

关于使用相同的会名和相同内容的信件一事，大阪地区的“父母会”召集人承认在这方面有全国性的横向联系，曾就书信的文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磋商。而进行非个别地区的全国性的联络协商，仅仅在书刊发行几天内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发刊前就要进行有组织的准备。另外，全国性的横向联系的核心非“编纂会”莫属，“父母会”等只不过是其顶名团体而已。

“父母会”一直申辩说与“编纂会”没有关系，但大阪的“父母会”召集人同时也是“编纂会”大阪支部的事务局长，大阪“父母会”的地址也同时是“编纂会”大阪支部的所在地。邮寄费用仅大阪一地推测就达800万日圆以上。大阪“父母会”的会员只有200人左右，如果会员个人出资的话，人均则需支付4万多日圆，显然是不可能的。

“编纂会”在向各地的议会、教育委员会进行教科书采用选择

问题的请愿与申述时,则回避使用“编纂会”名称,而使用“关注教育市民会”等名称。在免费散发《国民的历史》一书时也故伎重演,给人一种“有策划的国民运动”的感受。

《国民的历史》所描述的危险“历史像”

《国民的历史》一书本来是“编纂会”作为今后欲发行的新编教科书的“试用版”而于1997年11月策划的,同时展开庞大的宣传攻势及订阅100万册的运动。

“编纂会”就《国民的历史》这样解释说:“我们正在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但是教科书的容量篇幅有限,而编写教科书的试用版可以在新编教科书的基础上,将教科书不能充分表达的视点、内容、故事、插曲等包括进去,让普通的人读起来赏心悦目。”(“编纂会”会报《史》1998年1月号)产经新闻社也在其报纸社论上介绍说:“教科书的试用版是通常教科书的四、五倍的份量,以讲故事的风格写成,不仅适用学校,也是让包括家庭、区域社会在内的广大国民喜爱的历史书。”(《产经新闻》1998年1月9日)

但是,《国民的历史》并没有写成教科书的试用版。作者西尾干二很早以前就放弃教科书“试用版”的风格,改为“历史评论文集”的形式,并已经征得“编纂会”理事会的同意。可是,作为发行者、承销商的产经新闻社、扶桑社在发刊前并没有向会员及预订者通告,依然以教科书“试用版”的名义进行宣传,直到《国民的历史》发刊后,才在书的封面上删掉了在宣传广告传单的封面照片中的“试用版”字样,应当说这是欺诈行为。

《国民的历史》不仅不是试用版教科书,也谈不上是历史书。作者西尾氏的所谓“历史评论文”,正确地讲不过是“饶舌、独断、偏见的历史厥词”(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氏语)。由于篇幅的关系,在

此不能将《国民的历史》的内容全部涉及,下面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进行点评。

例如,该书对近代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亦即“日中 15 年战争”,几乎没有涉及。这不仅无视“20 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的战争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史这样基本的历史史实”(笠原语),还抹煞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所举历史事实缺乏严格的根据,到处充斥着随意的主观臆断。“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作战”、“屠杀平民”等当然是在抹煞之列。自然也不可能有对于侵略战争、加害、战争犯罪、殖民统治等的反省,而是把战争描绘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再如,改书名为《国民的历史》,其实“国民”(民众)并没有登场。通读全篇,前后出现的都是“日本国家”,所以说,改名为《日本国家的历史》或《非国民的历史》倒是更准确些。

又如,《国民的历史》对 20 年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就已有定论的问题任意篡改,作者依据的所谓“发现”,完全是他的随意编纂。该书大量引用其他人的成果,但许多是违背原著本意的,可谓是“逆用”、“反用”,进而对日本的知识界多有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作者妄称日本的历史在绳文、弥生时代就已形成了灿烂的文化、文明,没有受到所谓大陆(中国、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交相辉映,为他国少见。书中还充满了赤裸裸的对中国、韩国的偏见与蔑视、歧视意识和偏狭的民族(国家)主义情绪。

这种偏狭的民族(国家)主义情绪,即以“本国国民为中心主义”导致的国民的所谓“觉醒与自豪”,与国际化格格不入,是一种以危险的“国民意识的统合”为目的的逆历史潮流的东西。

“编纂会”发动的篡改历史的“国民运动”

1997年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小林善纪等为中心成立了“编纂会”，目的是攻击反映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事实，特别是慰安妇等旧日本军残酷行径和战争犯罪的教科书，将其批评为民族“自虐史观”。“编纂会”编写了作为2002年初中教科书的“历史”与“公民”两部分，在2000年4月向日本文部省提出了审议申请。发行为产经新闻社，承销商为扶桑社（产经新闻的子公司）。历史部分的执笔者为高森明敕事务局长（国学院大学讲师）和坂本多加雄理事（学习院大学教授）。公民部分分别由西部迈（《发言者》主笔、编辑负责人）、佐伯启思（京都大学教授）、佐藤光（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宫本光晴（专修大学教授）、八木秀次（高崎经济大学副教授）、杉村芳美（甲南大学教授）担任。教师用指导书和学生用学习笔记的编写由“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担任。

“编纂会”拥有会员约1万名（1999年11月末止），在全国所有的都道府县设有支部，年度开支超过1.3亿日圆，保守派系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教委主任等均有加入者。“编纂会”以攻击现行教科书“自虐”为目标，使用该会编写发行的宣传印刷品在各地开展“历史学习运动”（历史篡改势力在全国各地举行的研讨会、讲演会等，仅我本人的统计，1998年有170次，1999年达250次之多）。

这种历史学习运动的中心意图便是将“日中15年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否认日本的加害，将日本的历史美化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他国少见的伟大历史，并将这种历史认识强加给国民。因此可以说它是以篡改历史为目的的运动。“编纂会”将该运动看作是在2001年初中历史教科书通过前的“前哨战”。推进这项运动的母体为“编纂会”设在各

地的支部。他们在各地攻击、诽谤现行教科书存在“自虐的、反日的”倾向，向各地地方议会、教委提出要求，要求改变现有的教科书审议通过制度，力图使自己的新编教科书获得通过。他们大量免费散发《国民的历史》一书，人为地制造其教科书获得国民支持的舆论假象，都是围绕这一目的。“编纂会”还在东京 23 个区的区议会中，提出要求修改审定制度的请愿、陈述状，结果至 1999 年 12 月为止，已有 4 个区的议会通过了他们的要求。

篡改历史运动和攻击教科书活动的中心力量是上述“编纂会”和改宪组织“日本会议”（由右翼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保全日本会”在 1997 年合并后的组织）。两团体在中央及地方联手合作，沆瀣一气展开活动。例如，“编纂会”的青森县支部长同时也是“日本会议”青森运营委员长；“编纂会”长崎县支部的支部长同时是“日本会议”长崎的副会长。两者在各地建立了“东京教育再兴网络”、“广岛县教育会议”、“教育再生——地方议员百人及市民会”（关西）等名目繁多的组织，美其名曰“国民运动”，实为加强以对教育、教科书为首要目标的教师及学校的攻击。他们推进的“国民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新法西斯运动”。

“编纂会”以 53% 的民众赞成修宪的读卖新闻的调查为据，认为舆论对自己有利，所以针对篡改历史教科书运动的目标竟然大放厥词：“在三年至五年内决胜负”、“必须对包括安全保障、宪法在内的日本国家构造的病根进行医治，我们的运动富有打开突破口并改变日本国家的神圣使命。必须让日本成为健全的国家”，“为了孩子们，必须保卫日本。将孩子们培养成光辉夺目的优秀青少年是使日本国家再生的关键”，等等。他们认为完成上述使命的最后机会就是“编纂会”的“国民运动”，所以要把篡改教科书看作是“今天最大的国民运动”，是“对日本的教育、国家施加影响”的最好机会。

“编纂会”篡改历史的运动前途渺茫

20世纪是民族自觉及国民主权大踏步前进的世纪,但不管是民族自觉还是国民主权,都是在激烈的拼杀中取得的。因此,20世纪也可以说是战争的世纪。20世纪的前半叶日本是在对亚洲进行侵略中走过来的,日本发动了给亚洲的民众带来莫大伤害的侵略战争,犯下了战争罪行。在对20世纪的历史仍记忆犹新的今天,来自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犯罪、战争责任进行谢罪、承担战争赔偿的诉讼不绝于耳,日本政府对此却时至今日一直没有诚恳、认真的对应态度。

国际上,人类为超越战争的20世纪,构筑和平的21世纪,在战争违法、战争犯罪等问题的制裁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日本国民也在放眼国际视野,努力谋求与亚洲及世界各国民众的共生。与此相对应的培养正确的历史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编纂会”等团体的篡改历史运动和攻击教科书的行径是对上述国际潮流的倒行逆施,是使历史车轮后退的行径,它必然招致来自亚洲及世界的责难,使日本在国际上孤立。“编纂会”的主张和运动不仅在国际上行不通,在国内也是行不通的。

日本政府曾经以日韩共同宣言(1998年10月)、日中共同宣言(1998年11月)的形式,向韩国、中国表明了对昔日侵略、殖民统治的一定程度的国家角度的反省和谢罪。尽管时至今日,发表否认昔日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妄言而被迫引咎辞职的大臣不在少数,但他们的主张很难成为政府的正式见解。再者,如去年的西村真悟防卫政务次官(当时)关于“核武器的发言”、“蔑视妇女的发言”也遭到了许多国民的抗议和批判,被迫辞职。这些情况说明国民的和平意识、宪法感觉仍然是健全的。这是“编纂会”的致命问

题,他们的运动明摆着是没有前途的。

而且,正如接下来要介绍的那样,“编纂会”内部也矛盾重重,对立丛生。

“编纂会”在1999年7月的理事会上,解除了藤冈信胜、涛川荣太两人的副会长职务(藤冈降为理事,涛川退会),高桥史朗被选为副会长。对此,“编纂会”解释是为了本会的运营进一步健全化,促进运动更加发展云云。其实该改选闹剧的直接起因是在月刊杂志《谎言的真相》上披露了涛川“女性问题”的绯闻,背后则是藤冈与涛川因领导权利之争引发的相互揭短的内讧。两人公开相互诽谤、中伤,使该会的运营出现困难。而且,笔者认为藤冈与日本会议的主要理论家中村桀氏(独协大学教授)的公开对骂也是原因之一。现在,“编纂会”强化与日本会议的相互合作,这种背景下,原来作为副会长的藤冈、涛川两人已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高桥史朗(明星大学教授)就任副会长给人一种踌躇满志的印象。高桥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右翼活动家,“胜共联合”(右翼团体)的主要人员,也是日本会议的成员,与中曾根康弘原首相有很深的交情,与日本自民党的鹰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中心人物卫藤晟一众议院议员是右翼活动的盟友,能够在“编纂会”与自民党之间牵线搭桥。将藤冈氏介绍给日本自民党的就是高桥。会员近1万人的该组织的这项人事变动可以说其政治态度更加右倾化的表现。

除此外,“编纂会”内还存在着藤冈与小林善纪的对立等内部抗争与矛盾。小林与藤冈的对立在“从大局出发”的原则下被抑制,藤冈向“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发出了“整肃煽动对立的言论的紧急呼吁”。尽管“编纂会”的内部崩溃尚不至于很快,但是明显看出是没有前途的。

与“编纂会”抗争的运动及组织

违反宪法的日美防卫新指针关联法案是将日本拖入战争战车的使日本能够进行战争的“战争法”，而“编纂会”等篡改历史的活动则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补充，通过否定侵略与加害，弘扬“作为日本国民的觉醒与自豪”的历史认识，将国民意识统一到所谓新国家主义运动（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目标上来，进而实现“军事大国”、“战争国家”的梦想。这一活动的骨干成员，原防卫大学教授柿谷熏夫在1999年10月还出版了《征兵制可以拯救日本》（展转社）的书籍，提出以建立“战争国家日本”为目标。

“日之丸”、“君之代”的强制出笼、法制化与这一目标也是联系着的，下一步就是篡改教育基本法和宪法，瞄准的都是孩子与青年。

《国民的历史》虽然不是新历史教科书的试用版，其内容也不会原封不动成为“编纂会”的初中教科书的内容，但是与新历史教科书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将来“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也是很危险的。决不允许用这样的教科书作为改变教育、改变孩子、改变教师、改变学校、改变日本的“国民运动”的教材和武器，决不允许将这样的教科书强加给日本的孩子、教育、学校。但是，由于“编纂会”的运动得到自民党、自由党议员及财界的支持（财界的许多人是“编纂会”赞助者），因此对他们的活动发展不能掉以轻心。

在向亚洲及世界越来越强调和平共处的21世纪迈进过程中，应该实施让孩子们直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教育，让他们理解战争的被害与加害，从不同的侧面学习和理解历史。为此要编纂反映历史真实的教科书。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十几年前开始，关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有了一点改善。右派们的目的就是再一次

逆转这种局面，决不允许历史的车轮倒转。

与“编纂会”的斗争，现在是关键时刻。在1996年—1997年，篡改历史势力发动了要求将“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地方议会通过决议运动，当时，各地的市民运动、工会组织与革新派系议员携手，展开了抵制并不让其目的得逞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我们虽然力量很大，但由于对他们的危险动向的信息重视不够，而且当时没有建立能与“编纂会”抗衡的全国运动的网络，没有能够在当时实施有效的反击。所以，建立能够有效与“编纂会”或“日本会议”等右翼团体抗衡的全国性、地域性的运动和组织的必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 义文，1941年生，日本“面向21世纪的儿童教科书全国网络”事务局长；译者笈志刚，1962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出版

由王晓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30万字，15.80元)详细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闻界的斗争和中国报纸发展的真实情况。评述了国民党、共产党、日伪三方在该时期的新闻宣传、新闻管理和没有硝烟的新闻战，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闻观和日伪的新闻政策，揭露了日本对华的新闻侵略及破坏抗战新闻宣传的罪行，论证了日伪宣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